



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STUDY AND CARRY OUT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CONFERENCE

周 航 主编

习近平总书记在金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思想引领、精神旗帜和行动指南。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紧紧围绕讲话内容，从宣传思想工作建设、网络宣传工作建设、对外宣传工作建设、党性与人民性关系以及宣传思想工作实践等五方面集中论述了学习心得，并结集出版，以此激励读者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信念与使命

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周 航◎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念与使命: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周航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130-2745-8

I. ①信…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5636 号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出版:刘译文

信念与使命 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周 航◎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7

责编邮箱:zhaojun@cnipr.com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04千字

定 价:49.00元

ISBN 978-7-5130-2745-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科文库

四个文集编委会

总 编:谭维克

副总编:周 航 殷爱平 许传玺 赵 弘

编 委:王燕梅 朱霞辉 朱庆华 俞 音

《信念与使命 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编委会

主 编:周 航

副主编:齐福全

目 录

中国文化阐释与意识形态建设	谭维克 李建盛(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面临的困境及当代创新	杨 奎(12)
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郭万超(19)
文艺创作生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 音(23)
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信任危机与新型信任关系的重构	李彦军(28)
更加鲜明地体现和突出核心价值观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几点工作	陈界亭(32)
宣传思想工作要注重党史文化	孙照红(37)
破解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危机	张 苏(43)
加强立法引导,发挥新媒体的正面宣传作用	刘 蕾(49)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贾 澎(56)
社会趣味的培养与正能量的传播	黄仲山(62)
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形势 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任立军(68)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殷星辰(74)
“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	
——以群体性事件为列	姚 兵(81)
以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引 加强首都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建设	李 茂(87)
论传统媒体在突发性事件舆论 引导工作中的主阵地作用	左袖阳(92)
以社科调查数据平台建设为抓手 加强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	熊 炎(98)
努力将中国声音打造成世界最强音	施昌奎(102)
客观认识中国机遇与挑战和洞悉世界格局与变局	刘 波(108)
基于国际互联网平台的对外宣传工作方式创新	向 征(113)
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升华	李江涛(117)
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	陈 镭(119)

宣传思想工作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张 丽(124)
中国精神:对外宣传工作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契合点	田 蕾(131)
信息共享时代的网络传播生态与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	王林生(136)
“中国梦”外宣工作中应重视跨文化阐释	张 力(146)
如何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	孙 伟(152)
法治国家与文化意识形态管制	王伟伟(160)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郝 苑(167)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李婉莉(171)
论“党性”和“人民性”:一种政治哲学的视角	王玉峰(175)
党性化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	孙照红(180)
宣传工作应坚持人民性	王双洪(185)
坚定信念与问题导向	
——领会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思考首都文化建设着力点	沈望舒(188)
论加强首都核心价值观舆论引导力建设的实现路径	尤国珍(197)
建设一流地方社科院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	袁振龙(205)
把握时代脉搏 提升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创新力	
——北京城市交通管理创新启示	庞世辉(212)
新型媒介传播与首都网络宣传对策研究	陈红玉(221)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主创新	戴光宇(225)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背后的论辩与启迪	赵雅丽(233)
建党初期政治口号宣传的演变与启示	王建伟(241)
后 记	(249)

中国文化阐释与意识形态建设

谭维克 李建盛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他高度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and 意义,从四个“要讲清楚”指出了宣传阐释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文化并不是意识形态,但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理解和解释,但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从意识形态来理解和解释,这不仅基于文化的复杂性,而且基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从所有文化都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做或深或浅的理解和解释来讲,宣传阐释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之间便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离不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必然是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不仅作为我们观看、理解事物和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而且文化本身也是我们理解事物和世界的一种方式,历史形成的文化把我们置身于文化所形成的传统之中,它既形塑了我们的传统,也形塑着我们自身,并且将形塑我们的未来。在这个历史性的过程中,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既是我们理解我们的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创造性地激活历史的文化和创新性地塑造我们理解和解释事物和世界的文化活动。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看,阐释中国文化便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内在关系,也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深刻的联系。由此,如何理解意识形态问题,如何理解中国文化阐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在宣传阐释中应该具有一种怎样的问题意识和诠释方式,便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与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概念,出现于1796年。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启蒙运动哲学家和由专制转向革命的安东尼·德斯图·特雷西发明的,它被用以命名观念唯物主义科学,它不同于实证性的科学,也就是不同于我们现在所指的

自然科学,因此,“意识形态”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跟随 J. 洛克和 B. 孔狄亚克,特雷西认为,观念的理性内容可以通过弄清它们的感性起源来把握,因此可以促进道德和政治纷争的解决。然而,在德斯图·特雷西的使用和解释中,意识形态具有一种贬义。那时的人们并不是从正面的、肯定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例如拿破仑就用这个概念来批评那些追求抽象教条而不是关注社会和政治事实的思想家,认为这些思想家只是观念地理解和解释世界,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地理解和解释世界。在意识形态复杂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思想在这两种方向和两种意义上被运用和研究,通过参照它与其他基本的、非意识形态的现实,意识形态分享了被特征化、被理解和被批评的概念系统的观念。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重要的用法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来自撰写于 1845—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是为了批判德国哲学家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年轻黑格尔派在指责他们的意识形态同伴时,嘲笑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的弊病可以追溯到错误的观念和启蒙运动,通过理论错误的治愈能够带来社会解放。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思想是人类生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是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思想同样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一定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p8)} 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可以是否定性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这取决于谁作为理解的主体,取决于谁具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取决于意识主体的阶级属性,不同的解释主体具有不同的解释,根据不同的解释主体可以理解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也就是说,我们对意识形态的问题必须作社会历史的理解,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的理解和阐释也就就会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生存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p30)}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观念性地理解和解释事物尤其是社会存在的方式,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虚假性的双重性质,正体现了意识形态理解和解释的重要性,它告诉人们如何才真正认识事物,深刻认识事物的真实。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各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

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2](p15)}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重视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100)}

很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对物理世界的数学化、实证性的理解,作为“观念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一种理解性的想象,被理解为人们观看、认识和理解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这些意识形态形式无疑是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思想观念的反映,它们凝聚为思想意识形态,并反过来成为人们观看、认识、理解甚至评价和判断事物乃至社会存在的重要方式,这同时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在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社会关系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存在,只要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存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就存在,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性也就存在。在中国全面开放的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所体现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树立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规范性、价值导向性就变得非常重要。

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看,文化与意识形态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无论文化还是意识形态,即使在阶级社会中都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或一般的精神生产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也就是“意识形态阶层”的精神生产活动;二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自由精神生产,也就是“一切非统治阶级的独立的自由精神生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意识形态阶层的精神生产活动,还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上的自由精神生产,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都是人类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资源,而这种文化财富和精神资源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文化,它是历史的积淀,是历史实践的成果,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传统,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是它所拥有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传统、观念意识、文化精神和文化智慧。

二、宣传阐释中国与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充分说明,在全面开放条件下经济建设

和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两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引导,既基于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同样也基于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复杂性,所以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因为具有极端重要性,因而意识形态也更加复杂。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宣传和阐释中国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精神,在当前情况下同样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力量,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刻认识到当今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我国文化的建设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第一次在党的报告中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更加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重大意义和实践作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从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做出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方式,它不仅引导人们怎样认识和理解自身,而且引导人们怎样去观看和理解周围的世界。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同样是关系到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我们自身,引导人们如何观看和理解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深刻分析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不仅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 and 作用更加凸显,而且也给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带来了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也就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

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他特别强调在这个引导过程中要“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提出了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传统，诸如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中华民族创造和形成的灿烂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现了伟大的人文精神，展示了今日和未来仍然具有巨大生命力和仍然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伟大文化精神，诸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贵和尚中”爱好和平的精神等。这些人文精神传统不仅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而且代表了中华人文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对世界作出的独特贡献。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蕴含和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人文主义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大精神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内容。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强调，在人与天地之间，人是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就有着“天大、地大、人亦大”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家思想家，一贯反对以神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无论是儒家的三纲（明明德、亲民、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逍遥体道的自由精神，抑或是宋明理学中的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所强调的以道德修养为理想目标的人本主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主题。因此，在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思想家对这一精神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各派别的思想家和文化思潮所关注的焦点，都始终围绕人生的价值目标、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和人生境界的追求来确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主题。

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集中概括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刚健中正的人生价值。孔子提出的“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的“刚毅”思想所提倡的正是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努力的积极进取和独立人格的写照。而《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的思想便是对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思想和精神的高度概括。刚

健是一种最重要的品质,所谓刚健中正就是要求刚健而文明。自从《易经》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提出以来,它就始终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拼搏和积极进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传统和人生信念。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的独立自主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晶。

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便是,中国文化始终崇尚和谐统一,西方文化侧重分别与对抗,这种基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贵和谐,尚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基本文化精神之一。我们的传统思想认为,“和”是不同事物的配合所达到的平衡,新事物不是在对立中发展,“和”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它充分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厚德载物,只有以广阔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接受和容纳不同的文化和意见,才能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它提倡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的兼容并包、相互渗透和多样性的统一,正如《易传》所说的“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中庸》中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文化思想正是通过践行“贵和”精神和“尚中”的原则,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天道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和谐发展。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的团结友谊的传统,“贵和尚中”、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等,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原则。这些历史悠久而伟大的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中国特色”既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凝聚,也是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体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明天的中国同样承续着今天的伟大实践,在中国的历史过程和实践发展中凝聚和体现着中国的特色,开辟着“中国道路”和凝结成“中国梦”。从思想意识形态、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上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梦”就是对中国社会秩序和发展所描绘的一种蓝图。在这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概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们既要历史地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也要实践地认识把握中国特色,更要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因此,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就不仅仅是宣传和阐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同样也是宣传阐释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的存在之基、发展之魂、精神之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在这块沃土上形成的“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就是解释、引导、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如何发展以及将来如何发展的观念和原则,它们融合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应该说,这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且更是一种伟大的实践。文化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力和竞争力的象征和体现,而且发挥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它关系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奋斗目标、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到价值导向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任务,也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任务,它不仅是一种理论的阐释,而且更是一种实践的运用。在这里,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就必然与意识形态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

三、自觉自信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阐释

在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宣传阐释中,我们既要有文化自觉又要有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中,我们如何理解和阐释我们视野中的文化,如何理解、阐释和宣传我们的文化以及如何认识和理解他者的文化,我们如何创造性地理解诠释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是文化发展、文化创新和和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尤其在全面开放条件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也不只是一种单一的传统,我们处于历时性的文化与共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多种文化的理论话语与丰富多样的现实文化事实相互交汇的多元文化语境中,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化话语资源,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建设今日中国文化,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怎样的问题意识?这既需要我们有深刻的文化自觉,也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讲点粗浅的认识。

首先,我们的文化视野中有什么(What)?

对于我们当前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语境来说,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文化话语和资源可谓应有尽有。从中国古代各种形态的儒道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到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的各种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观念、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话语,从西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到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从西方的古典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近代的尼采到现代西方的各种流派的理论家,从主张人文科学特殊方法论的诠释学之父的狄尔泰,到反对方法而坚持人文科学真理的加达默尔,从主张现代性是一个未尽的事业的哈贝马斯到颠覆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德里达、福柯和理查德·罗蒂等,从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占有地位的各种人类学文化学研究到近年来为中国学者所热衷的新式“文化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到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同时或先后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在近代 100 多年的历史文化中,许多中国学者都有一种“拿来主义”的文化精神,自近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到 20 世纪末“只要有参考

价值的便都拿来”的做法,使中国人看到了许多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看到的東西。正是这种“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拓展和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视域。在今天这个被称为“地球村”的信息技术社会中,从地理空间说,“地球村”的出现极大地缩小了居住在世界各地各文化系统内的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原本属于“各个村落”的世界居民“走到了”同一个“村庄里”,各种政治经济和技术文化在这个缩小了的地理空间中汇聚在一起,各种相异的文化现象甚至相互冲突的文化思潮出现在某种同时性的空间中;从历史时间角度说,“地球村”的出现,把各种原本属于不同历史时间中的文化传统带到了当下的全球性场景中。加上百年来中国的“拿来主义”精神,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诠释学视野的广阔性是以往的中国历史中前所未有的。这种“拿来主义”的“文化视野”恐怕也是其他的国度和文化系统所不可比拟的。在我们的视野中,正可谓“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宣传和阐释中国特色需要有一种战略视野,一种战略意识,在国际国内的语境中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特色,立足中国特色的宣传、中国文化的阐释和中国文化的建设,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阐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才能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地阐释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

其次,我们如何创造性地诠释(How)?

“在我们的诠释学视野中有什么”是不成问题的,摆在我们面前和进入我们视野中的是文化的纷繁复杂和多种多样。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阐释?”也就是对于某个诠释主体来说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文化话语和文化资源的问题。当代哲学诠释学认为,对任何理解来说都是一种从前见理解出发所做的一种解释,根本不存在不带诠释主体前见的理解。在中国诠释学中,有所谓“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研究方法,其实这二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后者固然明确承认自己对经典文化文本的诠释总是根据自身的文化需要和所面对的问题来进行的,然而,前者也并不意味着诠释者就没有自己的偏见,没有熔铸诠释者的主观偏见和问题意识于其中,尽管前者把重点放在“六经”上,但它仍然是“我”在注六经,而这其中的“我”则总是一种具体历史性和特定文化性的存在,既然如此,也就不可能有绝对中立的理解和诠释。这就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立场和需要来阐释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就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我们如何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and 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来认识、理解、阐释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和积淀了丰富深厚的文化传统,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和文化遗产。宣传和阐释中国不仅是一项传承性的工作,而

且是一项创造性的任务。我们应该发挥诠释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弘扬。首先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诠释我们传统中有什么。既然是理解和诠释,就总是对某种文化资源和文化理论资源的诠释,尽管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重构性的理解,但我们却应该对诠释对象有一个基本恰当的理解和解释。即中国文化究竟说了什么?中国特色在哪里?它之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它之于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战略性是什么?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说或为什么要这样说?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全球性差异话语并存”的文化语境,既是我们今天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优势在于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可以利用的话语资源,挑战在于我们很容易陷入别人的话语中而丧失自己,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对我们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理论和话语资源没有一个基本“我注六经”的理解过程,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六经注我”的应用,也就是,我们要在这种全球性差异话语共存的文化语境中,对自己传统的和他者的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我注六经”的“解经”的过程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在诠释过程中就不仅仅是“误读”和“误解”的问题,而直接就是“曲解”。因此,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文化话语如此多元,各种思潮如此多样,理论如此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从事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文化的创新和建设,必须对我们究竟“如何阐释”有一个恰当的文化视域。就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来说,我们应该在一个怎样的中国视野和中国文化语境中来理解、阐释和宣传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这个重要的阐释语境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传承和熔铸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并规定了我们的中国特色。

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创造性地诠释(Why)?

文化的创新创造总是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密切相关,阐释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同样需要创造性地阐释,需要服务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我们现在的诠释学视野中有什么”和“我们如何诠释”,最终的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诠释?”诠释学意识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解和解释,而且更强调阐释的“应用”。我们之所以理解和解释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所以以一种开放性和对话性的文化态度和“拿来主义”的精神来对待他者的文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在诠释的基础上应用性地解释和决定自身的问题。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各种思潮和各种论战,可以说都并不是为了理解而理解,为了解释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和创造性的创新,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的需要而做出的阐释和发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非常深刻、精辟和准确。他说:“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3](p630)]在面对我们文化传统、面对我们文化问题时,都面临着“为什么”的问题,都需要一种问题意识,面对着“我们为什么要诠释”的实践性问题。同样,我们今天在诠释自身传统的文化思想和他者的文化理论话语的时候,也有“为什么要诠释”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一百多年来一直从别人那里拿来,即使在今天这个被叫做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也总是拿来,总是别人在“化”我们,我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化”过别人。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文化事实。但我们同时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拿什么去“化”别人。这里涉及我们有什么“文化资本”的问题,你有了文化资本才有文化市场,你阐释了中国特色,才能去宣传和告诉别人我们的中国特色是什么,才能得到认可和认同。如果说来说去都总是跟着别人说,而没有说自己的问题,更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连我们自己都“化”不了,又怎么去“化”别人。如果我们一直在“输入”别人的东西,我们又拿什么“输出”?澳大利亚文化学者在谈到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问题时所用的标题是“为我所用”。他特别提醒人们要注意文化研究的特殊语境问题,不能搬用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我们也一样,我们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诠释他者,不是为了简单地重构或机械地挪用,而是在理解和诠释的基础上,实践性地解决自身的文化问题。在今天,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既是理解、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也是为了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具有这样一种属于自己的诠释学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才能发展和创造出有自身品格和自身特色的文化思想,才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全面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作为诠释主体的中国文化诠释者要富有创见性的文化思想,就必须要有—种恰当的文化视域,认真思考“我们的诠释学视野中有什么”“我们如何诠释”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诠释”的问题。这既体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自觉,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的文化自信。这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建设的文化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宣传和阐释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

谭维克(1954—),男,四川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

李建盛(1964—),男,湖南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